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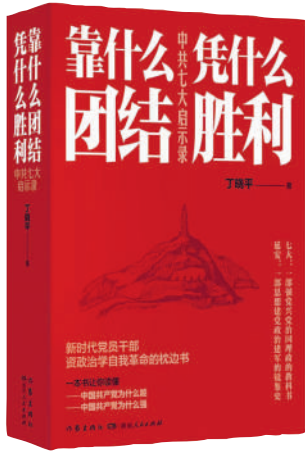
力量源于团结 团结就是胜利

■丁晓平



创作谈

展现心路,延伸阅读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党的七大召开80周年。以党的七大历史为题材的创作,我在10多年前就开始了酝酿和准备。因为党的七大的历史,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令我着迷而神往,决心要写出这本《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作家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随后,我埋头查找搜集史料,阅读《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作家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年谱等书籍,并多次前往延安革命圣地参观学习,深入历史现场,领悟革命精神。

真正动笔创作是在2022年。这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同志来到延安,瞻仰圣地,缅怀先辈,展现信念,宣示决心。在党的七大会议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表示,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

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七大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作出了高屋建瓴的论述,揭示了我们党“靠什么团结”和“凭什么胜利”的历史密码,给了我思想引领和精神向导,更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心和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延安的革命岁月是中国革命史雄伟壮丽的篇章,也是治国理政的历史活教材。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这本读不完的书找到了答案,而党的七大正是这本书的关键章节和精彩高潮。“团结”和“胜利”不仅是党的七大的主题词,也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关键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词;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时代性;是永恒的历史命题,也是永恒的政治课题。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保持团结,追求胜利,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文化。

写什么不是问题,怎么写才是关键。从我过去的创作实践来看,历史写作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让故事依然保持新鲜和悬念,在推陈出新中无限接近和抵达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从而让人人都能在历史中看到新意,读出新思想,获得新启迪,增添奋力前行的力量和勇气。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历史写作主要是让读者“开眼界”。而要让读者“开眼界”,作家首先得自己有眼界。这就要我们

必须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如何发现呢? 那就必须找到问题,找到历史的活的灵魂。

结构是蓝图,是思想和逻辑的样子,是努力把看不见的东西变成看得见的东西。在创作中,我试图站在更为宏阔的高处来观察历史,以天花板式的视角来进行顶层叙事,努力让读者获得视野开阔、立体简洁、收放自如的阅读享受,让历史在我们的心中复活,从而建筑起历史写作与历史阅读之间的桥梁。因此,《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的写作,我决心以问题书写为导向,以历史书写为根本,以文学书写为依托,以故事书写为牵引,以思想书写为灵魂,从而完成历史整体的由点、线、面组成的立体的几何性书写。

深思熟虑之后,沿着上述创作思路,我紧紧抓住“团结”和“胜利”这两个关键词,带着“靠什么”和“凭什么”的设问,建立了一个以党的七大为中心的历史坐标系。它以“两种中国之命运”之“光明的中国”为正方向,以“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纵坐标,以打败“两个敌人”、建设新中国的目标任务为横坐标,将书稿分为6个篇章,即:“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没有我们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除第一章标题来自陈毅的诗句之外,其余各章标题都源自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报告和讲话。全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解答了党的七大为什么延迟17年召开、为什么搞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什么要作历史决议、如何处理好有中美关系背景的国共关系、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赢人民战争、如何进行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和建设光明的人民的中国的6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我知道,要想全景式反映党的七大的历史及其给新时代带来的启示,不是靠讲故事、说轶事、聊往事或者凭想象就能完成的,而是一项巨大的创作工程。也就是说,《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的创作,不仅是重述人们知道又不完整知道的那段历史,而是要力求从一个更辽阔的视野、更高远的视角,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呼应时代、观照现实,让置身现实的我们在历史中找到奔向未来的正确方向和伟大力量。因此,在本书6个篇章中,我又设立了5个方面共30个具体问题,从宏观、中观、微观三重视角,全方位解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群众在延安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各领域的成功探索、伟大实践和历史经验,呈现我们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经过,呈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这块“试验田”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锻造延安精神的光辉历程,进而揭示“力量源于团结,团结就是胜利”这一革命事业成功的真谛。

党的七大,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了史册。党的二十大鲜明提出了“两个确立”,是新时代新征程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关键所在。历史经验一脉相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从延安窑洞的星点灯火到新时代的星辰大海,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团结奋斗”创造历史伟业。正是从这一重大意义出发,《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的创作,紧紧围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延安坚持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为主线,以历史事实来回答“靠什么团结”和“凭什么胜利”这一时代命题,从党的七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凝聚政治智慧和时代精神,探索“从胜利走向胜利”之道,让奋进新征程的人们从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在现实中感受新时代的思想光芒。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明代诗人于谦在《观书》中写道:“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这穿越600余年的诗句,至今仍在书架间流淌着温润的光泽。当指尖轻抚过泛黄的书页,仿佛触摸到故人衣袖的纹路;当目光轻掠过跳动的文字,宛如望见旧友含笑的眼眸。

书卷的深情,在于它能让时空在方寸之间交融。翻开《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仿佛化作边塞长风,拂过高原哨兵肩头的霜雪;展读《史记》,司马迁笔下的易水寒波,可与舰艇劈开的浪花重叠。军营里的阅读,更像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当官兵在《西行漫记》中触摸延安窑洞的灯火温度,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里听见松骨峰战役的呐喊,那些铅字便化作淬炼信念的燧石。正如英国作家毛姆在其著作《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中所表达的,即便在装甲车的轰鸣和冲锋的号角声中,书页依旧能撑起一片精神的绿洲。

古人与今人的悲欢,常因一卷书而相通。叶嘉莹先生晚年重读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想起自己漂泊的一生,竟在千年诗句中找到知己。那种跨越时代的共鸣,让书页间的情感变得尤为深厚。正如苏轼在《江城子》中深情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百年后,当人们在异地他乡,面对生活的种种不易,这份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与哀伤,依然能在苏子的词句中找到慰藉。

读书的妙处,在于总能在字里行间找到灵魂共鸣。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设若枝桠折断,春天唯努力生长。设若花朵凋残,春天唯含苞待放。设若暴雪狂风,但只要春天来了,天地间总会飘荡起焦渴的呼喊。”初读时,我只觉是慰藉之语,直到在战术训练场目睹战友带伤完成障碍穿越,才对这文字背后沉甸甸的生命重量,有了属于自己的体味。那些曾令我辗转反侧的训练短板、竞赛失意,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矿井下的灯光中,在《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第85次拉紧钓索时,都化作催征的战鼓。

这种共鸣,往往源于作者与读者共同的生命体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这行文字在某装甲中队图书室的留言簿上激起了层层涟漪。有位指导员曾这样注解:“就像在荒漠里发现绿洲,读到这里时,装甲车发动机的轰鸣都成了冲锋的号角。”这种跨越时空的共振,恰似钱钟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当《吕耀诗文集》中青海荒原的

书卷多情似故人

■王 静

朔风与喀喇昆仑的暴雪相遇,当《昆仑约定》里知识分子的坚韧与边防军人的执着相映,文字便不再是沉默的符号,而化作指引精神的北斗。

在这个信息奔涌的时代,纸质书的墨香依然保持着独特的魅力。犹记某次野外驻训,夜宿樵坪山麓时,有位排长借着月光读《边城》。他说纸质书的触感让他想起家乡的青石板路,沈从文的文字像溪水般洗去白天的疲惫。这种人与书的羁绊,恰似故人踏月而来的清辉,不会因时光流逝而黯淡,反而在岁月沉淀中愈发醇厚。

书卷多情,最是那润物无声的陪伴。我在装甲车轰鸣的间隙,在长途行军的休整时,总能看到官兵捧书静读的身影。这些细碎的阅读时光,如同战术地图上的等高线,看似零散却勾勒出精神的高地。当某天在沙盘推演中灵光乍现,当在极限训练中突破自我,那些曾经读过的文字,早已化作血脉中的铁,悄然铸就生命的筋骨。

杨绛先生说:“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在江南雨巷的茶香里读《陶庵梦忆》,于大漠孤烟的哨所中翻《战争与和平》,文字始终以故人的姿态相伴。合上书页时,阅读带来的不仅是内心的宁静,更是一种精神的托举——正如敦煌月牙泉永不干涸,书卷中的智慧长河,亦将永远滋养着求索者的心田。

儿童视角:独特的抗战文学景观

——评小说《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

■陈 苏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每一位作家都有以作品向自己的故乡致敬的方式。上海有着丰厚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对于儿童文学作家简平来说,他把对这座城市的敬意和深情,寄寓在新作《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中。作品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上海老火车站附近的一群流浪儿,从为一口残羹冷炙、一处栖身之所奔波,到在年轻革命者的帮助下萌生民族大义,并在魔术表演中掩护革命者完成重要任务。作品力图通过这些故事带领小读者聆听历史的回响,反思战争的本质,触摸文化的根脉,汲取成长的力量。

在中外儿童文学史上,战争与孩子是一代又一代作家着力关注并倾力书写的主题。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并没有随着战争年代的渐行渐远而褪色。面对和平年代的小读者,如何跨越80多年的时空,如何将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相融合,如何把握战争描写

的尺度与当代儿童的接受心理,都是写作中的难题。作家简平多方查找史料,寻访作品中涉及的地点,深入魔术社与孩子们一起学魔术,给出了对战争与孩子这一命题独具匠心的解读方式。

作品在创作手法上,以严谨的写实风格刻画真实的历史场景。这部以抗战时期上海为背景的作品,地域色彩鲜明,卷首的地名交代了小说所涉及的地点的“前世今生”,文末的地图则勾勒了故事发生以及人物行动的空间。故事的时间跨度不大,从1940年冬天到1941年春天的短短数月。这样既便于情节推进的紧凑,又喻示着流浪儿从饥寒交迫的严冬到迎来希望的春天的转变。

在精心构建的小说时空中,该作品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而是以日常化叙述的方式切入。战火纷飞的时代,6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聚集在一起。书中将他们的行踪设置在宝山路一带的北火车站、均益里、泰山大戏院、界路饭店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地点。为高度还原、精确描写历史场景,作者对每个地点进行了考证,发掘鲜为人知的史料,并在情节中巧妙融入当年商业广告海报以及某日《申报》的报道,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穿插其间还有“一二·九”“八一三”淞沪会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作品中这些日常化的叙述折射出抗日战争的宏大背景。

真实的地理环境、真实的历史事件、扎实的细节,如同绘画中丰富的“图层”,共同营造出了有光影、有肌理、有烟火气的历史情境。于是,懂事的绍承、急躁的天根、爱哭的阿宝等流浪儿,以及机智勇敢的地下抗日组织情报员“小姐姐”,栩栩如生地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

人物的鲜活离不开契合儿童心理

和历史依据的细节刻画。当绍承在八字桥上帮车夫推车以赚小费,夜晚从垃圾车里找出清道夫的坎肩给小伙伴御寒,《三毛流浪记》中的画面仿佛跃然眼前。虚构的故事与逼真的场景嵌入,带给读者十足的真切感、现场感。

在情节设计上,作品以魔术为故事核呈现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魔术是作者创作灵感的触发器,承载了他以儿童本位的创作观,也是作品中孩子与当代小读者心灵沟通的纽带。游戏是童年生命成长的有机部分,残酷的战争、苦难的生活,并不能改变孩子爱玩好动的天性。作品中,流浪儿在破棚子里玩踩影子的游戏,在街上围观兜售狗皮膏药的表演,得知热心帮助他们的小姐姐会魔术,自然对不可思议的魔术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学魔术练就的耐心、毅力和勇气,还有团结的精神,正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品质,也为孩子们最终帮助小姐姐完成任务埋下了伏笔。魔术在作品中发挥了作用,既符合儿童的天然性,又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并寄托着丰富而深刻的寓意,为黑暗岁月平添了一抹亮色。那是童年的底色,也是希望的色彩。

在主题立意上,作品以文化传承为纽带赋予成长内涵。虽是战火纷飞的时代,作者并没有让笔下的孩子直面太多的血肉腥风,而是饶有深意地在情节中融入了文化的元素。故事的发生地宝山路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文化集散地”。作品中,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惨遭日军炮火的摧毁,小主人公绍承的父母为抢救图书馆的古书而献身;孩子们在革命者大哥哥的引导下,读起了少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小癞痢》;在小姐姐的南派魔术师拜仪式上,师父道出了魔术在中国悠久的历史

以及“中国环”的寓意……

另外,作品中还出现了鲁迅、巴金等文化大家的名字,民新影片公司摄制人员与守军一起抗日的身影,这些既是历史场域的建构元素,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脉,更是少儿成长的精神沃土。文化的传承,为心灵成长注入了民族精神的内核以及绵长坚实的力量。这和简平曾撰写《上海少年儿童报刊简史》,担任过上海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儿童出版馆的策划不无关系。儿童文学融入地域文化,使得作品更“接地气”。作品中出现的上海俚语“碰哭精”、朗朗上口的沪语童谣,令流浪儿垂涎欲滴的“四大金刚”,以及从孩子们去下海庙领施粥票引出上海之名的来历,无不带着浓浓的“上海味道”。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在作品中巧妙交织,让读者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场域。

整部小说的谋篇布局值得称道,体现了作者对于当代少儿审美情趣的准确把握。作品每个章节始终循着儿童阅读心理特点,既没有过多铺陈,也没有刻意渲染,有的是行云流水般的情节推进。叙述节奏张弛有度,偶尔的“吃青菜剩芋芋”上海方言梗,在紧张的情节中适时地调节气氛,有着笑中带泪的效果。惊奇、历险、幽默……作品所包含的元素,几乎戳中小读者所有的情绪点,吸引他们进入故事情境,产生共情共鸣。

遥远的年代,近切的场景;沉重的主题,轻盈的童心;虚构的故事,真实的历史……在《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中融合在一起,这源自作者对革命历史题材与当代儿童审美表达之间链接的探索。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样本为少儿实现沉浸式阅读提供了多种可能。

新书架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大象出版社)是探讨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学术著作。本书以“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为契机,深入剖析“文化上和政治上早期中国”的内涵与外延,梳理“庙底沟文化”的形成和扩展过程,系统总结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特别强调文明化进程中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心地位。该书不仅概括考古学文化嬗变的区域性差异,还深入探讨早期中国文化中的“一元多支一体”总体格局,展现史前中国演进的宏大历史脉络,体现对中华文明连绵不断根本原因的深入思考。

(甘昌昌整理)



长征

第6476期